

罗振玉协助大生纱厂购置纱管

□朱江

张謇与罗振玉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密切的关系,1901年张謇与罗振玉等共同发起设立通海垦牧公司,1902年张謇设立通州师范学校,罗振玉是张謇坚定的支持者。



1900年1月12日孙淦给张謇的信,还揭示孙淦在给大生纱厂提供纱管过程中,与罗振玉的关系。信的开头提及:“前由法邮船寄呈木管样大小六个,并缮寸牋附入农会转上。”孙淦通过法国邮船带到上海6个纱管的样品,并附上一封信通过农会转给张謇。这里提及的农会,即1896年罗振玉与徐树兰、朱祖容和蒋黼等人 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务农会(又称农学会)。1897年4月29日张謇日记记载:“复蒋伯斧、罗叔搢讯”,即回蒋黼和罗振玉的信。5月9日张謇日记又有“答蒋伯斧、罗叔搢讯,论农会”,可见相互间就务农会的事宜进行探讨。张謇还于1897年6月11日撰写《请兴农会》,赞誉务农会:“近日上海设立农学会,专译东西洋农报、农书,未始非中国农政大兴之兆。”张謇与罗振玉在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保持密切的关系,1901年张謇与罗振玉、汤寿潜、李审之、郑孝胥、何嗣焜等共同发起设立通海垦牧公司,1902年张謇设立通州师范学校,罗振玉是张謇坚定的支持者。

大生档案里保存了同时期孙淦写给罗振玉的3封信,根据信末的时间,分别为1900年1月19日、1900年2月23日、1900年2月25日。从1900年1月19日信里“月之十二、三日,叠邮两函,内附季公委购之木管九箱正、副提单及中、西文货单各乙页,又半□□□印底暨覆季公信一件,当邀转达矣”分析,张謇为大生纱厂向孙淦购买纱管,具体事宜委托给罗振玉操办,由此孙淦在发货的同时,给罗振玉的信中夹有纱管的提货单,此外孙淦致张謇的信也通过罗振玉转达。由日本运来的纱管,须由海路到上海,通关后再转运南通。张謇并不常驻上海,罗振玉本身与日本方面联系较多,因此由罗振玉代理纱管购置事宜顺理成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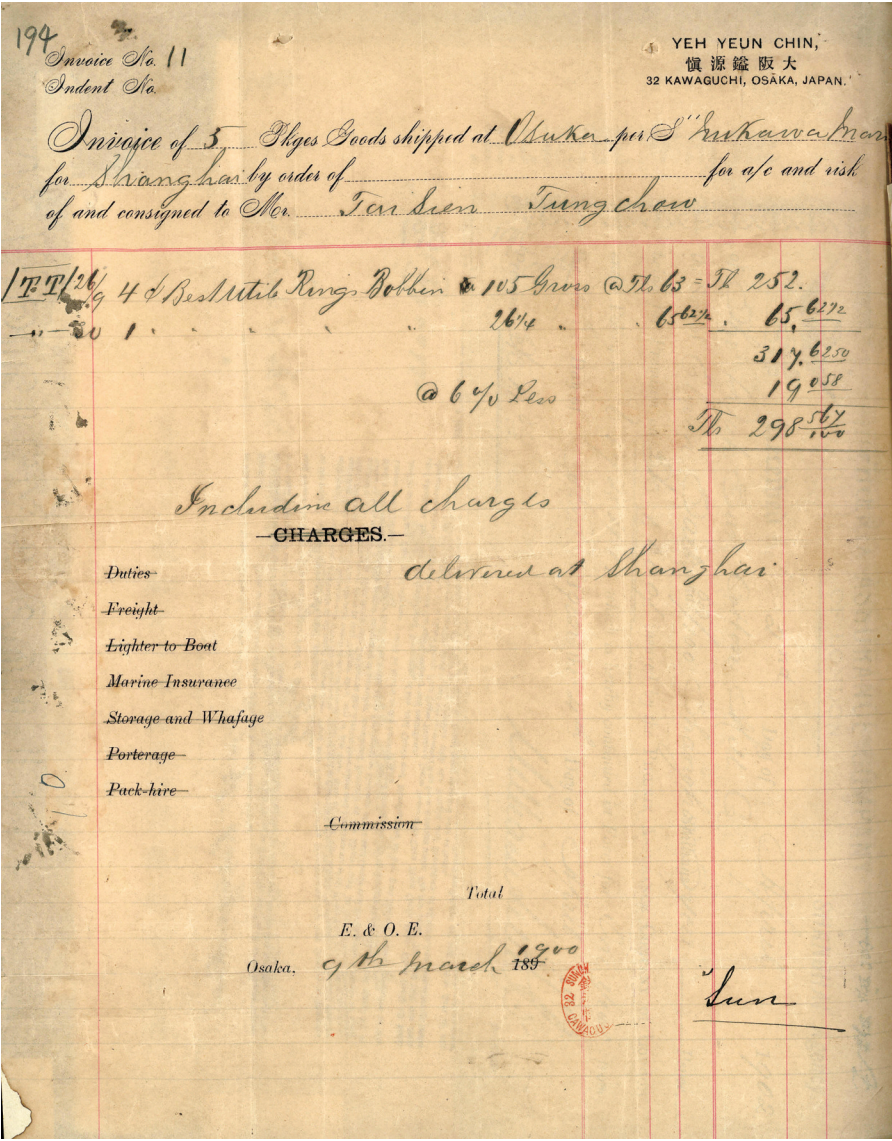
孙淦与罗振玉之间的通信相对频繁,由1900年1月19日信中所言“本月七日未刻,曾发一电至尊处,又于初五日迳寄木管样,未知到否,殊以为念”,以及1900年2月25日信件提及“廿三、四日长门丸、山城丸叠上两函,当邀赏鉴。内附中、西货单及提货单各一(系通州纱局之木管十一箱)”,可知孙淦通过电报和海轮携带信函的方式,告知罗振玉发货情况,并附上提货单。

至于货款支付情况,孙淦与罗振玉约定通过电报暗码告知。1900年1月19日信尾,孙淦列出如下暗电码:

- 1、张公已回通汇银年内不及。
- 2、张公虽经回通货款由信汇报。
- 3、银由申汇坂不便。可由坂汇申照付。

- 4、只允先汇五百两。
- 5、今由汇丰电汇日金壹千元。
- 6、今由汇丰电汇日金貳千元。
- 7、今由正金银行电汇日金壹千元。
- 8、今由正金银行电汇日金貳千元。

孙淦约定,上海方面给他发电报,电报内容只需要三个字,分别为他的英文名字“Sunchafoo”、大阪“Osaka”和以上的暗码之一,按照当时电报费每个字洋6角的标准,一封电报花费不过2元。孙淦信中还提出电报费用先请罗振玉垫支,日后奉还。1900年2月25日信里补充,如果张謇在上海,亲自兑付汇票的话,发暗电“1001”,如果是大生沪账房工作人员兑付,则按原来约定暗码



慎源慎商行给大生纱厂的发货单

发电文。

1902年5月15日,孙淦从大阪发往上海的英文纱管货单背面,给罗振玉写了一段中文留言:“四月八日由弘济丸运上宿字墨漆纱管三箱,每26.25罗,计78.75罗,每罗二两八钱,共元貳百廿两〇五钱。同,本色(即白漆)纱管四箱,同,计105罗,每罗二两六钱,共元貳百七十三两正。共计元四百九十三两五钱,除百之六进口税计二十九两六钱一分,合计净元四百六十三两八钱九分。”信尾是恭语“上罗大老爷 孙淦托”。这段留言清楚写明黑漆纱管和本色纱管的单价,进口关税的税额。5月23日,大生沪账房记载:“农会报馆楼卓如兄送来提单。”

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拼茶的嵇公堤

□沈文群

物资,尽快处理好遇难的同胞的善后事宜,尽快排涝降渍,从外地高价召集和雇佣劳工,堵塞三处决口。按照堤身损伤程度,全面修复。大修工程结束后,尽快集中一切力量建一条能担负护卫范公堤的新堤。整体工程计划花费十年时间完成。嵇曾筠呈报朝廷,雍正帝一一准奏。

这是一项耗时长、工程艰难的民生工程。从开始到一切事务处理完、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,已经三年时间过去了。彻底堵塞三处“倒口子”,兜堡式围堰造堤开始后,嵇曾筠虽尽职尽责,但由于劳工不足,加之担泥要在落潮后到百米之外取土,劳工们要赤脚在一脚烂泥一脚水的沙滩上行走,夏天的沙滩被太阳晒得像被火烤过一样,不仅热得人头发晕,脚上还会被烫起泡;冬天劳工们为了便于行走,也不得不把裤管卷高,腿脚冻得发红发紫,不是常年在海边生活的人又怎能承受呢?而且一旦烂泥挑到围堰处已所剩无几,因而围堰三处“倒口子”就花去近两年时间。接着根据堤身的损伤程度,全面进行修复,填满了所有被海潮冲击和大雨淋成的坑坑洼洼,再将堤顶堤坡进行了空前的加高和拓宽,然后用石碾夯实。

雍正十一年,范公堤全面修复结束,紧接着及时进行了新堤施工。由于新堤建在范公堤南侧的内地,不受涨落潮的时间影响,因而增加了大概百分之四十的时间;不受修堤在泥水中取土担泥的累苦影响,一年四季都可穿鞋行走;不受路远挑的烂泥在路上损耗的影响,堤身两侧五十米外均可挖成深塘取土,干泥满筐筐掉不了,堤身积土堆高速度快,功效倍增;不受冷冻和烫脚之苦楚,加之就近安营扎寨和生活条件改善,劳工们情绪好干劲足。嵇曾筠深入工地慰问劳工,认真听取劳工们的建议和要求,用以指导工程进度和质量,并奉献了自己的俸禄。

新堤于雍正十三年全部竣工,其模样奇异罕见:堤高约丈一多,全长5350余丈,约15公里。堤身各地段与范公堤的距离相差极大。新堤两头都与范公堤陡台呈尖形夹角状,整个堤身似半壁长弓状。东端在一总小洋口闸处与范公堤汇合,西端在四十总(现耕茶镇江安村一组)与范公堤汇合。其汇合处的模样,像农家磨粮食时牵拉石磨转动的磨把,故此处又叫“磨担头”。新堤三十总至三十总地段,距范公堤最远有三里多路。此处海域涨汐港丫最多,潮流极为凶猛而罕见。

史海回眸

小忆“优上中下”等次

□程太和

1969年9月,我上小学一年级。那时正处在“学制要缩短,教育要革命”的新形势下,学校的教学工作也“创新”,将文化考查(考试)的“百分制”改成“优上中下”四个等次。一个班级在期中或期末文化考查中,“优”等次的约占10%，“上”等次的约占50%，“中”等次的约占30%，“下”等次的约占5%—10%。处于“下”等次的学生在学年末往往处于“留级”状态。为了准确且平衡把握“优上中下”等次人数,学校也将传统的“百分制”与新等次进行了粗框架的衔接,考试分数在90分以上者为“优”;80—89分者为“上”;60—79分者为“中”;59分以下者为“下”(传统的说法叫“不及格”“挂红灯”)。此标准再参照上述人数比例进行适当调整。这就是学生文化考查成绩。

当时我的语文、算术是“优”,体育、劳动是“上”,唱歌(音乐)是“中”。唱歌是“中”,实际上就是“下”。因为唱歌是副课,正常情况下没有“下”这个等次,且得“中”的也没几个,所以我是名副其实的“下”。究其原因,也是天生的基因所致,我的喉咙粗,人家叫我“樊喉咙”,唱起歌来实在难听。叫人意外的是,我上三年级时,学校新调来了一位老师姓徐,教我们算术,同时也教我们唱歌,因为我的算术成绩正常都是100分或99分,徐老师爱屋及乌,竟将我的唱歌给了个“优”。我知道,这个“优”是极端名不副实的。

大约在上二年级的时候,“优上中下”又改成了“优良中下”等次。即将原来的“上”改成了“良”。二年级的第二学期,两门主课语文、算术仍采用“百分制”计分,体育、劳动、唱歌按“优良中下”等次考核。且当时有种说法,主课是考试,副课是考查。考试按“百分制”得分,考查按“优良中下”四个等次考核。

如皋红专学校办学难

□余青

1958年秋,全国进行“教育大革命”,又响应党中央“又红又专”的号召,红专学校陆续在全国各地兴办起来。红专学校又称“红专大学”,培养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专业知识优秀的人才。如皋也不例外,《如皋市志》述及此校:

1958年3月,勇敢乡创办全国第三所乡办农业中学勇敢农业中学……至1965年,全县兴办农业中学79所,办班115个,在校学生4123人。其间,部分农村社队兴办耕读小学,县级机关和部分企业创办“红专学校”。

如皋籍教育家杨同芳先生的后人曾经告知笔者,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、六十年代初,杨先生就曾在如皋政协的红专学校授课,很受学生的欢迎。不过当时生活得很艰辛。多年前,我曾在书肆目睹多张如皋县直机关红专学校的《发放工资存查表》。这些约60年前的档案,纸张粗黄,字迹漫漶,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。细细比较上面的数据,也可看出当年的生活不易。其中1962年3月及4月的《发放工资存查表》等,字迹相对清楚,都可佐证。每张表格左上角印有“编制机关”,后面空白或填写:“县直机关红专学校”,或“县直机关学校”。这充分说明,此所“红专学校”属于“正规军”,属于编制单位。

时任校长为钱秉基。这位钱校长是如皋文史爱好者熟悉的。他曾任县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(1984.11—1986.7),后又去如皋政协任职。钱秉基不仅于《南通文史》《如皋文史》发表文章介绍季恺的革命事迹,记述国民党军队及伪军在如皋的历史,而且鼓励商界的周思璋老人(后成为如皋文史专家)撰写有关如皋文史的文章。除去校长,如皋县直机关红专学校时任教导主任为臧兰,另有三四名老师,其中陈正凤(又作陈震凤)最为稳定。还有来校工作时间仅两个月(1962.2—3)的校工何秀英。

钱秉基等人的工资高低不一。1962年3月,钱秉基校长、臧兰主任月薪分别是64.5元、34元。殷道济、陈正凤、吴宝玉、于鸿珍四位老师的月薪分别是64.5元、43.5元、40元、34元。校工何秀英月薪为18元。四位老师中,月薪最高的和校长持平,月薪最低的和教导主任一样,可见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尊重。月薪60多元无疑是那时的高工资。

不过国家正经历三年困难时期,全力推行计划经济,校长、老师的实际月收入(可支配收入)其实没有那么多。这些在《发放工资存查表》中得到充分体现。钱校长月薪为64.5元,但此月他须向公家缴纳房租1元、家具费0.2元、电费0.25元、还借金10元、伙食费20元、工会费0.65元等费用,共计48.71元,实发工资仅有15.79元,仅约占预发工资的25%。当时大多数人,都依赖国家,住着公家房子,用着公家家具,像于鸿珍老师的工资比例更为极端——预发工资是34元,扣除各种费用,实发工资不足5元,可支配收入不足预发工资的15%,平均每天只能花费1角5分。殷道济可能年事已高,又有自己住房,成为众人中唯一预发工资等同可支配收入的。臧兰的情况相对较好,也无需扣除住房、家具等费用,实发工资约24元,可支配收入约占月薪60%。

一个月之后,即四月的《发放工资存查表》,学校工作人员只有四位,除去校长、教导主任,只留下吴宝玉、陈正凤两位老师。他们四人的月薪没有变化,但是可支配收入又有下降。尤其是钱秉基校长,依然需要扣除房租1元、家具费0.2元、电费0.25元、还借金5元、伙食费20元、工会费0.65元等费用,同时又要扣除上月及本月伙食费约30元,归还借款20元,他最后的可支配收入只有3.87元,仅占月薪的6%,平均每日零花钱费用不足1角3分。教导主任臧兰的可支配收入也有明显下降,实发工资只有8.73元。只有陈正凤的情况相对稳定,可支配收入维持在20多元的水平上。这种趋势不是一时的。再看是年5月至9月的《发放工资存查表》,纸张越发紧张起来,原来印好表格的大纸张,全部换成直接手写的《发放工资存查表》。钱校长每月的可支配收入不仅维持在个位数,到6月份仅获2.4元。7月份,全校只剩下三人,老师只有陈正凤一名。10月份,钱校长的可支配收入逐渐好转。

即便只有三人,在当时生活条件不易的情况下,他们依然又红又专,将县直机关红专学校坚持办下去,真是不易。

征 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

地名掌故

清雍正二年(1724)七月中旬,耕茶场到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。四十里范公堤巍然屹立在场地心地带。北侧海滩上,建有上百座大大小小的潮墩,盐民们忙着铲土、晒灰、烧卤制盐,盐业生产成了耕茶场一大支柱产业。范公堤南侧,到处是泥墙草屋成堆的村庄和渔村,先民们一半农夫一半渔夫地生活着,既从事农事耕种,又靠海吃海,下小海进行捕捞。北串场河(耕茶运河)上,运输木船穿梭。耕茶街和浒湾、港头小集市面上,客商云集……耕茶人安居乐业地幸福生活着,却忽视了近在眼前的黄沙洋存在巨大危险性:场东端小洋口、一总范公堤就处在黄沙洋东端“洋口子”上。赖以生存的范公堤当时还处在浅海边缘区域,虽几百年无大的灾害发生,虽年年进行局部和外围堤坡的修复,堤顶面上长满了防止水土流失的三尺高的蒿子草,但由于年久欠妥善修复,堤身已逐渐变低变小,抗御潮流的能力越来越小,而且海中一无名沙丘(现东台市弼港),也助推了潮水的泛滥。

农历每年的七月和八月的初二日、十七日(七潮水,忌讳“吃”音又称超零潮水),初三日、十八日(八潮水),这两个月的八天(八个“潮水”),潮力最强,潮位最高,如果再巧遇北三面强台风的降临,那潮力那潮位就会随风力的大小程度而变动。俗话说“秋潮随风起,七潮八潮如马跑”,这是真实的写照。这年的农历七月十七日或十八日,已建成700多年而一直较为太平的耕茶所属范公堤在已进入大汛中主汛期,又处在七月半大潮汛期限时,突遇强台风暴雨的袭击。空前的巨流海潮和暴风雨形成“天水流”合成的巨流,彻底改变了以往循序渐进进行涨潮的规律,一开始就呈半米高的重浪急流“涨水头”一字形地横冲直闯,吼声如雷地向范公堤冲击而来。原来约七八十分钟潮水才到范公堤,这一回,在短短的二十多分钟时间内,就冲到堤身,并很快漫过所有堤顶,一总小洋口、三十二总、三十九总范公堤首当其冲被冲开一条大口子,潮水无任何阻挡。水进入北串场河,向整个江海平原乃至泰州地区蔓延,一片汪洋,致使49558人遇难。如今,耕茶地区仍流传着形容当时水位水势的民谣“九尺皇岸三尺篱,篱子头上浪淘淘”。

重大地震惊朝野,河道总督嵇曾筠亲临耕茶勘察,并根据民众的建议,制定了抗灾防潮的总体规划。首先尽快地筹集相适应的钱财、人力、抗灾